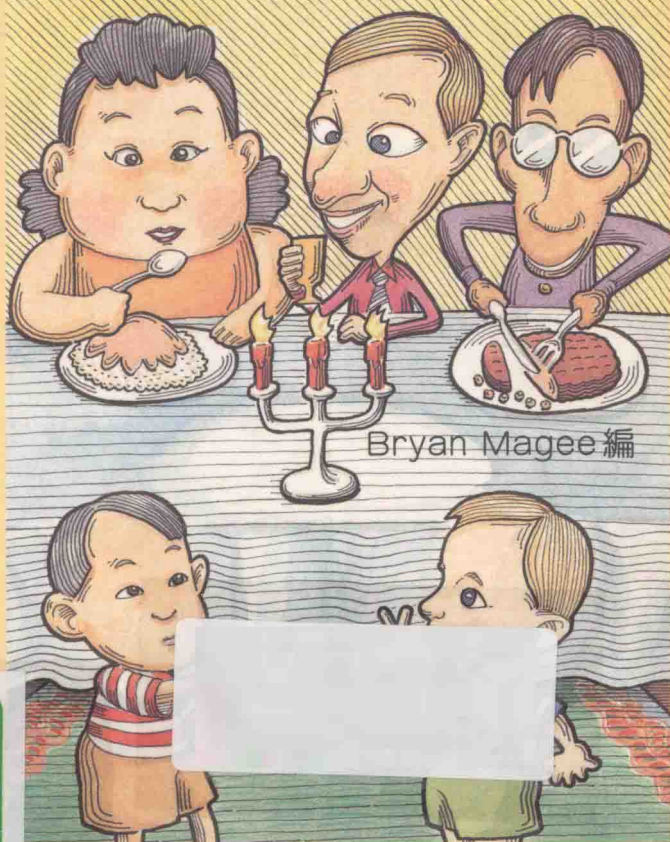


思想家對談錄 II

自由權利的 的 思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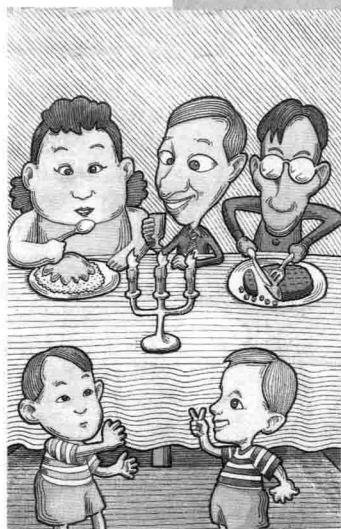
Bryan Magee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思想家對談錄 II

自由權利的 的 思索者

Bryan Magee 編



商務印書館

MEN OF IDEAS

Some creator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Preface and compilation © Bryan Magee 1978

Individual contributions © the several contributors 1978

First published 1978 by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思想家對談錄 II

自由權利的思索者

- 編 者 Bryan Magee
譯 者 周穗明、翁寒松及譚坊
責任編輯 徐啟章、黃文群
插 圖 高 嶽
出 版 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廈
印 刷 者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B1
版 次 199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1993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6160 X

Printed in Hong Kong

*The illustrations for this Chinese
edition have been add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總序

這本書的基礎，是源自1975至1977年編排攝錄、1978年1月至4月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播出的一輯十五集電視節目。設想出這一輯節目的是Aubrey Singer（當年BBC第二電視台的總監，今日BBC電台的總裁）。當時他邀請我幹這差事時，我勉為其難地接受下來，但條件是他要讓我全權負責。他要我制定出供審批的方案，我經過再三考慮和徵詢他人意見，提出了本書的計劃和有關的特約撰稿人。他同意了，於是計劃順利實施。

我的目標，在於將哲學這門學問中的一些最有趣的領域介紹給廣大觀眾。這就要求我將四種問題融為一體。首要回答的問題：有哪些著名哲學家？他們有何作為？他們所做的工作價值何在？其次，需要介紹一下有地位的學派思潮，如法蘭克福學派、存在主義、語言分析學派。第三，要對學科的某些相對獨立的分支也作一番介紹，如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科學哲學等等。最後，由於這一切只有置於哲學的最新發展背景下才可透徹理解，因而有需要提供多些相關的背景知識，尤其是涉及到馬克思、

維特根斯坦和邏輯實證主義的知識。在這四類問題中間，存在着已經播出的系列節目所呈現的自然邏輯聯繫，存在着造成各種思潮各領風騷的時代性。這四類問題在時間上也相互交錯有序。我謹遵循了這種內在規律。

當然，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當代哲學中一些最鼓舞人心的發展是那樣專門化，以至於難以用簡略的解釋讓沒有這方面知識準備的人釋然。例如，由倫敦的 Michael Dummett、美國的 Saul Kripke 和 Donald Davidson 等人提出的邏輯存在（logic being）方面的新見解，就是如此。另一個因素是與英語有關的限制。顯然，一個為英國電視台編製的節目，需要以精到而又易於理解的英語完成，而實際上這就意味着我幾乎不可能邀請非英語世界的人士上我們的節目——例如，我極想邀請 Jean-Paul Sartre，或許還有未亡故的 Martin Heidegger，然而語言的障礙使這種願望付諸東流。而 Karl Popper 和 Robert Nozick 則由於純粹的個人原因亦未能參加，令人遺憾。還有一個簡單事實，就是不可能把當代哲學的所有領域囊括於這十幾次討論之中；無論我採取甚麼辦法，都不可避免要割捨許多傑出人物和有趣著作。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從總體上提供一幅當代西方哲學最富活力的領域

的總畫面，希望這個以觀眾不具備哲學知識為前提製作的節目，能在他們中引起共鳴，喚起智慧。

以往為英國廣播公司第三電台製作的相似的節目，給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1970年冬，這家電台廣播了十三集的“與哲學家對談”節目。這個節目局限於英國哲學（修訂了的廣播稿以《現代英國哲學》〔*Modern British Philosophy*〕為題成書出版），所涉及的範圍無法與這次電視系列節目相提並論，但它的製作為這次工作鋪平了道路，使我熟悉播送方面的各樣準備工作和把它修訂成書的獨特工作程序。

編製電視系列節目和編製廣播系列節目一樣，計劃中的討論都要事先心中有數，雖不排除，但斷不能照稿宣讀。編製這種節目，我都要預先就兩、三個可能涉獵的話題會見有關人士，討論決定哪些是與選題有關的最重要的東西，大致確定如何運用我們的素材，以及大致確定怎樣分配我們的時間。然而毫無例外地，當我們到錄影廠進行拍攝時，事情總是會節外生枝，與事先的策劃大相逕庭——取捨的問題又冒出來。儘管如此，這種工作方法畢竟使我們能在攝影機前把高質量的準備與真正的活潑性、新鮮性揉合在一起。除此之外，我無法想像出還有哪些方法能使我們在如此短速的時間內探討如

此繁多的題材；假如準備過多，節目就會流於生硬沉悶，而準備過少，則會令人不甚了了。

討論中遣詞造句的隨機性，意味着討論記錄不足以直接付梓成書。討論中的語言不可能達到精確、美妙地使用語法和句法的程度，往往是信口開河，詞不達意，該說的未說，不該說的老是重複，如果就這樣付印成書，豈不令人厭倦。因此，我鼓勵撰稿人不妨修飾談話的文字——事實是我敦促他們充分自主地改進原稿，改進得越多越好，我所持的理由是本書有它獨立於節目的存在價值，要務使這本書成為獨具特色、令人刮目相看的著作。所有撰稿人都作了這方面的努力，有一兩位人士更達到了竭盡全力的程度（當然都保持了原型的色調）。

不過，儘管這本書並不僅僅是一個電視系列節目的記錄，它若離開這個系列節目畢竟無以存在。許多人認為它標誌着電視廣播的新發展。1978年1月20日的《時代》（*The Times*）周刊指出，在嚴肅性和影響範圍方面，以往所有普通電視網絡都不能與它相比。在這個系列節目播出時，我陸續收到觀眾的來信，信中有的說“終於有了一個成熟的節目”，有的說“這個節目恢復了我對電子媒介的信心”。而在一個星期以後，這涓涓細水變成了江河奔流。我希望電視台的總監大員對此作出認真的反

思。他們最終樂意播放哲學節目，固然令人欽佩，但我不得不說，他們這種遲來的決定，反映出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障礙，即從總體上仍然渺視“嚴肅的”電視節目。過去，除了教育電視以外，一般電視節目都先後編製過與所有知識領域有關的節目，就是懼怕編製與哲學有關的節目，他們害怕抽象的題目，以為它難以在電視這種媒介上完滿表達。電視台的人總是問：“哲學節目在螢光幕上能夠顯示些甚麼呢？”儘管答案十分清楚——哲學家的談話，但它與電視人的過時信仰之間的衝突是如此突出，以致於他們多數人都不會去想它，更不用說對它表態了。對他們來說，電視的中心原則是：“不要光講大白話——應當表演給觀眾。”於是，他們不希望在自己的螢光幕上看到所謂“只會喃喃說話的人頭”，他們認為這種除了談話沒有任何其他內容的節目“不是電視——只不過和電台廣播一樣”。對於電視這種傳播媒介來說，要想確立的個性，在其成長的時期，其工作人員持這種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就電視的合理發展而言，這是很不利的。當電視這種傳播媒介逐步走向成熟的時候，應要拋棄這種態度了。

這種新的要求可以從“嚴肅的”電視節目那裏廣泛感覺到。例如，時事節目日益受到批評：被指

內容只固於向觀眾交待事件，不能向觀眾顯示出其中的要旨，以至於使他們無法理解那些問題。電視提供大量的動態畫面——尤其是暴力畫面，它只以刺激人們感官見長，卻鮮有認真的分析和討論。他們有時也搞討論，但大抵是沙龍式的廢話，還有因希望使問題簡單明瞭的同時調動熱情、產生戲劇效果而故意製造的粗野罵戰。在電視節目中，存在着一種將所有素材弄成消遣性內容的傾向，正是由於這一點妨礙我們引導觀眾形成嚴肅性的要求，反過來又對這本應承擔的困難工作加以拒絕。他們總是認為，一個成功的節目應當解悶、娛樂、挑逗、活躍，甚至是直接爭取觀眾的注意。如果你想對觀眾提出嚴肅性的課題，有人就擔心這樣必然會失去大多數觀眾。

由於這種態度的盛行，已有的分析嚴肅性課題的嘗試，絕大多數並不是去把抽象觀念詮解為栩栩如生的語言，電視上依然是圖畫、照片、圖表、統計數字、詼諧的漫畫，甚至是印刷好的書頁，然後再伴之以令人心驚肉跳的音樂。這些做法當然不是全都無效，許多時甚至還是明智的。但更多的是在貌似合理的外表下的賣弄，其獨創性僅僅存在於對媒介的操縱中，而不在於對內容要旨的處理上，因而本質上平庸不堪，淪為耍小聰明的把戲。尤其是

當繪製圖表的本身並不理解所要解釋的概念內涵時，情形就更是如此。最糟的是，許多艱澀的概念問題根本不能用這種方法處理，於是它們不是遭到歪曲，就是以不適應在電視上闡發為由被遺棄。

所有這一切或者主要就是避免只會喃喃說話的人頭的惡果。人類處理抽象概念的“自然”方式是交談。堅持不用談話方式來處理它們，就如同堅持不用數字做算術一樣。做算術的數字最初誕生時是原始的、武斷的，但卻不啻是超越一切剛愎自用的。就電視來說，支撐其判斷的錯誤假定有很多，其中兩點卻具有決定性意義。第一是關於電視是一種視覺傳播媒介的原則。其實這種想法完全不對。電視將影像和音響二合為一，在這種結合中，它獲得了電台廣播的所有潛力。簡單化的程式（電視＝畫面，與此相對，電台＝聲音）與電視誕生時是置身於已發展起來的廣播電台體制中，它的發展取決於衝破廣播電台的既有束縛，進而將此信念制度化為極端自負的組織形式有關。因此，也難怪“我們不是廣播電台”這種說法時有所聞。但它導致電視的執拗傾向，只處理廣播電台不能處理的素材，而事實上撇開了它能處理的素材。這很像人在成長發展中的青春期反抗階段一樣，個體企望通過反抗雙親的支配而確立自己的身分；對他來說，重要的只是做他

雙親做夢都沒有想到要做的事情。這是發展中的必經階段，但這本質上是不成熟的階段。成年期意味着在不受任何脅迫的意義上無憂無慮地與雙親共享世界。當電視真正成熟時，它就應長成爲一種揉合聲音和視覺形象，內容充實、渾然一體的綜合性傳播媒介，以至於人們自然地覺得它的配音內容的重要，而決不只視它爲一種視覺媒介。只有幸運地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它才找到自我，開始發揮本身的潛力，而目前只不過是依稀看到了這種前景而已。

除了這個問題以外，隱藏在“避免喃喃說話的人頭”觀念背後的第二個錯誤假定，是對視覺吸引力的錯誤判斷。對大多數人來說，世上最有趣的目標是他人，而能夠顯現在電視螢光幕上的最有趣的畫面乃是他人的影像——談吐心聲、開玩笑、遊戲、唱歌、跳舞、或者直接表現他的日常生活。觀眾都極愛觀看有才華的人士談論他們的見識，以爲他們可以從收聽廣播獲得同樣的效果，那是錯誤和愚鈍的。一個人在表達自己思想的過程中，有許多東西是無法言傳的，如風度和舉止、面部表情的變化、手勢、身體語言、有形的躊躇，此外還有眉目的傳神。如果螢光幕上的人物善於運用這些有形動作，觀看當然比單純收聽更加吸引人。在這種情況下，人物比在廣播中表現得更加充實和豐滿，使你獲得

了與此人相識的感覺，此後你真和他見面時便會一眼認出他來，而通過收音機是決不能達到這種效果的。進一步看，電視討論也是一種滿足人們對各個不同領域傑出人士的好奇心的自然形式。哲學當然也不會例外；除卻政治家外，傑出哲學家同樣擁有大量可資聊天的話題，哲學界同樣存在着不少奇聞軼事；其中有些（如Isaiah Berlin其人）既可作為研究課題，又可作為小說故事的題材。

所以，希望作為這本書的藍本的電視節目製作，會為傳播媒介的未來貢獻出微薄力量，希望外間對它的熱情擁戴將有助於推動課題抽象、困難的節目的製作。英國廣播公司的製作人員，可視本書為他們努力成果的紀念。在此要鳴謝一羣出色的幕後伙伴：包括構思出這個計劃，並為此提供充分資源的Aubrey Singer；負責全盤行政安排的Janet Hoening；調度錄影室和攝影機的Tony Tyley。將節目內容製作成書，又牽涉到漫長而吃力的改寫過程，多重的打印工作，Bretty Nordan、Marianne Hazard和Linda Powell付出的辛勞必須一記。

代 序

這本小書譯自十多年前一個英國廣播公司的對話節目。商務印書館將對話譯稿分類出版，並邀我作序。自己絕非專家學者，恭敬不如從命而已。篇幅所限，只能就內文作簡介。

本書首部分是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泰勒（C. Taylor）教授開宗明義說，馬克思主義可劃分成兩大系統：一是解釋理論，一是解放理論。粗略地說，前者屬“必然王國”，後者乃“自由王國”；前者用以解釋人類歷史發展至今的必然過程，而後者則引領人進入自我解放以得自由的領域，亦即無產階級革命後建立的共產主義世界。箇中關鍵，是自從人類社會實行分工以後，各種罪惡接踵而來，人性備受壓抑和踐踏。要將人從這社會制度的枷鎖中釋放出來，必須克服因分工而帶來的“異化”。泰勒所稱的“弔詭”，就是人類社會向前推進，必然演化出分工，但人類又必須克服或超越這分工，即是消除所謂“勞心者和勞力者之間的分別”。至於“勞心者食人、勞力者食於人”，孟子稱為“天下之通義”，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無疑是在鼓吹

階級社會。

有趣的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其解釋理論是“科學的”“必然的進化過程”，於是引出一個疑問：其必然性的邏輯結論，會否令人無法打破其必然性而達到其解放理論所描繪的自由國度？泰勒明白指出，馬克思的解釋理論與解放理論二者不能契合，甚至往往互相矛盾。泰勒認為解放理論似應納入美學範圍，這也提供了一條途徑讓我們去思考。

一旦經濟剝削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隨之而消失；人人進入完全和諧的境界。麥基對馬克思主義最有力的反駁，是人類社會的衝突不全由經濟因素引起。馬克思主義沒有解釋這點。如泰勒所言，馬克思對其預言的共產主義社會甚少着墨，他的追隨者也無從知悉人是如何在該種社會下生活的。順帶一提：馬克思主義並不否定“個人”的存在，但人既是社會的動物，而革命又不是一個人的事，故個人在歷史中、在社會變革中，顯然無足輕重，甚至被完全淹蓋。換言之，為了集體得到解放，個人得犧牲掉。

這意念馬克思大概取自盧梭（J. J. Rousseau），亦即“人性會最終傾向自由並且集體的 control”。泰勒認為生當今天，馬克思亦會改變他的理

論。湊巧的是，泰勒本人現時似亦放棄了他早年“新左派”的信念，而不斷到處宣揚人的權利和民主自由——起碼在最近（1992年終）的有關西方政治文化與現代化的論壇上就如此。

有關“個人”的問題，不論在道德哲學或傳統政治哲學中，都佔據很重要的位置。但馬克思將個人溶入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來剖析社會，忽略了個人的獨特性與尊嚴。這點馬爾庫塞（H. Marcuse）亦一再致意。馬氏乃法蘭克福學派對英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六、七十年代西方馬克思潮流分裂成理論派和實踐派，法蘭克福學派屬前者。這個學派有一特色：學派中人都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但並不盲信教條，甚至對馬克思的理論提出批評與修正，這在本書第二部分“馬爾庫塞與法蘭克福學派”有精要的討論。

話說回頭。為甚麼本文一再強調“個人”這觀點？麥基的論說頗中肯：馬克思主義有反自由的傾向。即使共產主義社會來臨——不論是透過暴力革命或民主形式——個人的自由仍不獲保障。而當今人人推崇的民主制度的目標之一，乃在保障個人的尊嚴與自由免受集體所侵害。這恐怕是每一個人——不管你信奉何種主義——都應作出深刻反省的。

這點其實馬爾庫塞本人也留意到。人受到壓抑，需要得到釋放，這在任何社會皆然。所以他要以心理分析學配合馬克思部分學說合併運用，而他所針對的，或者說在他眼中現代人所背負的桎梏，乃先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異化。

說到“異化”（以前多稱作“疏離”），馬爾庫塞所論倒是一針見血。異化是指人與人及人與物之間因着生產方式改變而產生的一種關係。上文提到，沒有分工，則不會導致異化。這顯然是一個社會——經濟的概念。今天人人談異化，甚至離題萬丈者，把整個觀念弄得庸俗不堪。這裏要提醒讀者，人對生活的不滿很多，但並非全部皆源自生產關係。

身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猛將，馬爾庫塞指出他的學派最大的貢獻，在替西方文明把脈治病。他們對工商業文明發展到今天的局面不滿，提出全面性的批判。就此而論，這派已是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窠臼，其最終目標，仍如泰勒所言，是要建立解放理論。至於其對西方當代文明的全面性批判是否合理，脈是否把準了，治方是否恰當，不在此論。

值得一提的是，馬爾庫塞三番四次談及他最不滿的，是西方社會因資本主義發達而累積了大量財

富，卻用之不當，以致人的境界無法進一步提升，但自始至終，馬氏並無一詞譴責大量累積社會財富為不當，實堪玩味。

“哲學與政治”一文的主角是德沃爾金（R. Dworkin），但全文花了很大篇幅介紹羅爾斯（J. Rawls）和奴錫克（R. Nozick）震撼西方學界的著作。兩位學者大體的脈絡和重點德沃爾金已勾畫出來，不必在此贅述。值得一說的，倒是他本人的政治理念。

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德沃爾金在文內兩次提到他個人對“權利”的執着及自由對每個個體的重要。他認為人要有自由，則“每個人的生活應該由他自己決定，由社會越俎代庖簡直是對個體的一種最大的侮辱。”亦即是說，社會沒有權指定或規畫某種“最佳生活方式”而以社會的名義驅使每一個人向某一定的方向走。快樂的準則由每個人自己決定。當然，德沃爾金深明，人的決定會錯，但自決屬於每個人的“個性和尊嚴”的範圍，後果由自己承擔就是了。所以他提到自己跟另外兩位自由主義大師“走在同一條路上”時仍一再強調，政府不能把她視為美好的生活方式、或主義、或任何意識形態，強加在公民頭上，否則政府就變成專制暴君。